

学科突起与研究深化： 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 70 年*

安春英

内容提要 1949—2019 年，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经历了以学术评论为主的研究萌芽阶段、学术规范化的学科初创阶段、学科反思中的学术自觉发展阶段和中非关系研究引领下的学术研究深化阶段。中国非洲学界对于域外大国与非洲关系、非洲对外关系、非洲国家间关系、中非关系的研究，既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又体现为议题研究渐深渐细、研究方法愈加多元、研究力量渐增的特点。未来，如何均衡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学术布局、建构自主性学术体系、拓展研究新方法、加强学术话语传播能力建设，系该学科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 研究综述 非洲国际关系 研究选题 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安春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编审，《西亚非洲》常务副主编（北京 100101）。

国际关系学指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主要以各行为体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为研究对象。就此而言，有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兴起或设立，既是学术发展自身规律使然，也与其内在国际关系变化演变情势密切相关。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2019 年的 70 年间，其研究动力亦体现了上述内在的学术逻辑与现实国际关系逻辑的演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国内学界虽然涉及非洲国际关系研究议题，但是系统性、机制

* 本文在进行有关学科缘起找寻历史线索时，感谢外交学院李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青建教授、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和包茂红教授、南京大学张振克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张忠祥教授、云南大学梁益坚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杨立华研究员和吴传华副研究员提供相关情况。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论及 1978 年以来翻译类相关著述。

化、专业性研究则始于改革开放之后。纵观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脉络，它源于国际关系史与非洲历史研究、非洲政治研究的互动，涵盖域外大国与非洲关系（包括中非关系）、非洲对外关系和非洲国家间关系三个层面。本文拟通过梳理70年来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学术史及学科发展史，探寻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增长点。

1949—1977年：以学术评论为主的研究萌芽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中国学者涉足非洲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动力源自中国的外交需求。20世纪50至70年代，国际格局在雅尔塔体制的基础上，形成以美、苏两个超级强国为中心的两极格局，整个世界进入全面冷战时代。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这一时期非洲国家进入争取民族独立及巩固新生政权的历史阶段，政党、民族解放组织及后来建立的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影响不容忽视，非洲由此成为美、苏争霸的角逐之地。从中国国内情况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遂以主权国家身份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但当时中国处于东西方全面冷战的阴霾笼罩之下，面临恶劣的外部国际环境，先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后有来自苏联的对立敌视，由此中国外交需要破解美、苏两条线的外部压力。毛泽东主席看到了处于上升阶段的非洲民族国家力量，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理论，中国与非洲国家如何反对霸权主义的共同威胁成为双方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共同考量和共同利益。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学界给予智力支持。

这一时期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研究议题集中在世界各行为主体之间在非洲大陆展开的合作、矛盾、斗争等。学者以关乎国家与民族命运、国家利益为己任，研究视点体现为政治需要驱动、以解释和论证现实政治为主。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旨在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巩固民族独立成果，以及剖析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以此配合国家的外交需求。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非洲与美国关系^①、非洲与苏联关系^②、非洲与欧洲（主要指非洲

① 参见[苏]古卡褻著《美国与非洲》，新华译，载《国际问题译丛》1958年第3期；月异《肯尼迪政府对非洲的“援助”与扩张》，载《大公报》1961年9月12日；[美]门南·威廉斯著《美国对非洲的政策》，江枫译，载《亚非译丛》1962年第2期；[日]岗仓古志郎著《美国对非洲的经济侵略》，贝岱译，载《亚非译丛》1965年第11期。

② 参见[美]拉·皮斯特雷克著《苏联对非洲的看法》，陆竞生译，载《亚非译丛》1963年第3期；新华社记者述评《苏联在非洲的战略目标》，载《人民日报》1978年3月16日。

的前宗主国和欧共体) 关系^①、帝国主义对非洲的争夺与干涉^②、非洲国家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斗争^③，成为这一时期探讨非洲国际关系的主基调。当然，学界也聚焦于中非关系。

第二，研究成果形式以编译类为主，兼有政论性文章，严格的学术著述较少。国内对非洲国际关系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翻译作品。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对遥远的非洲大陆了解有限，学者对非洲的研究资料较少，而国际、国内形势迫切要求研究人员提供有关非洲与域外大国利益冲突、矛盾斗争的相关背景情况，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判断决策参考。在这种情况下，编译已有的相关论著、文章成为快捷的应对之举。这些译作中，以翻译苏联学者撰写的著作和文章为主，西方学者次之，也不乏非洲学者的论著。^④ 作品大致可分为专著^⑤、研究报告^⑥、学术资料^⑦、学术论文^⑧、一般性文章^⑨等。二是编著类。例如，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首都汽车公司二场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合编的《埃及人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一书，通过评介苏联是如何一步步实现对埃及的渗

① 参见 [苏] 厄金格尔著 《波恩的非洲计划》，立亭译，载《国际问题译丛》1960 年第 10 期；[葡萄牙] 德西瓦尔著 《葡属非洲殖民地的葡萄牙垄断资本》，崔华堂译，载《亚非译丛》1963 年第 7 期；[苏] 尤·伊万诺夫著 《荷兰资本在非洲》，傅素妍译，载《亚非译丛》1964 年第 6 期；[法] 马赛尔·艾格列多著 《法国新殖民主义和非洲》，瑞林译，载《亚非译丛》1964 年第 10 期；[英] 托姆·索珀著 《欧洲经济共同体对非洲的援助》，秦谊译，载《国际问题译丛》1966 年第 1 期。

② 参见曹锡珍 《帝国主义对非洲农业资源的掠夺》，载《地理知识》1957 年第 57 期；[苏] 苏斯曼诺维奇著 《帝国主义对非洲的瓜分》，文志玲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2 年版；[美] 麦凯著 《世界政治中的非洲》，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年版；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 《老沙皇对非洲的觊觎和渗透》，载《亚非问题参考资料》1976 年总第 27 期。

③ 参见 [苏] 列明等著 《帝国主义争夺非洲的斗争与非洲人民的解放运动》，史真、谢曜同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 年版；国际问题译丛编辑部编 《帝国主义对非洲的掠夺和非洲人民的斗争》，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年版；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首都汽车公司二场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合编 《埃及人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

④ 参见 [塞内加尔] 马·迪奥普著 《黑非洲政治问题》，萨本雄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 年版；[埃及] 伊卜拉欣·萨可德著 《俄国人来了》，杨期锭、吴永华、沈肇读、李玉侠合译，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⑤ 参见 [苏] 列明等著，史真、谢曜同译：前引书；[美] 麦凯著，北京编译社译：前引书。

⑥ 参见北京编译社译 《美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美国西北大学非洲研究计划处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年版。

⑦ 参见世界知识社编辑 《苏彝士运河问题文件选辑》，世界知识社 1956 年版。

⑧ 参见 [苏] 什皮尔特等著 《谁在掠夺非洲殖民地的财富？》，新华译，载《国际问题译丛》1958 年第 5 期；[苏] 格·罗什钦、[法] 菲利普·德克莱纳著 《法国对非洲：政策正在转变中》，江枫译，载《亚非译丛》1966 年第 5 期。

⑨ 参见 [苏] 柴格拉廷著 《法美的非洲争夺战》，韦文译，载《经济周报》1953 年第 17 期；[苏] 尤·安德列耶夫著 《对非洲的殖民掠夺》，岳峰译，载《大公报》1958 年 5 月 12 日。

透与控制，从而揭露了帝国主义寻求霸权的特性。三是政论性文章。主要刊载在《人民日报》《大公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媒体上。四是学术资料或学术著述。这一时期，由于当时国内学术刊物特别是公开出版的期刊很少，学术著述极为稀缺，张铁生的《中非交通史初探》（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非关系史专著）^①、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②、夏鼐的《作为古代中非交通证据的瓷器》（载《文物》1963 年第 1 期）、马坚的《中埃两国人的传统友谊关系》（载《新华月报》1955 年第 6 期）等，对中非关系研究均有开拓性贡献。

第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侧重采用历史研究方法，非洲国际关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历史研究。一战后，西方国家国际关系学科逐渐发展起来^③，并形成了自由主义、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但是，在冷战背景之下，中国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闭锁状态，与西方学界鲜有接触，不可能出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西学东渐”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关系研究与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关系甚密，非洲国际关系研究亦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则自然而然地被中国学者用于论及非洲与非殖民化、反对帝国主义等议题。此外，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于非洲国际关系的研究资料来源单一，以文献资料为主，难以对研究对象进行实地考察，还有学者自身的学术背景原因，致使非洲国际关系史研究特点突出。^④ 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文淳先生在《帝国主义是怎样瓜分非洲的》一文中，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典论述为指导，解析了非洲殖民地化的历史历程，并指出殖民统治对非洲发展带来的破坏性影响。^⑤

第四，非洲国际关系研究学科尚未建立，研究力量有限。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高强度国际政治斗争持续张力的背景下，尤其是 1961 年毛泽东主席作出对非研究的重要指示^⑥和 1963 年政府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后，国内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逐渐建立，既包括国际关系研究所

① 张铁生 《中非交通史初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5 年版。

② 张星烺编注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③ 1919 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了国际关系的讲席，这被视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起点。

④ 参见顾章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非洲的觉醒》，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 5 期；陆庭恩 《关于殖民主义者贩卖黑人的若干史实》，载《学术月刊》1964 年第 6 期。

⑤ 参见张文淳 《帝国主义是怎样瓜分非洲的》，载《历史研究》1978 年第 4 期。

⑥ 1961 年 4 月 27 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中东非洲外宾时指出：“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65 页。

(1956年,即现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所(1960年,即现在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代表性机构,也包括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1961年,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1964年)等专向研究机构。^①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来看,这一时期国内并未建立完整的国际关系学科体系,从事非洲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大多没有受过此专业系统教育,而是从其他专业转向而来。例如,中国非洲史研究拓荒者——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杨人梗先生,1958年由专攻法国大革命史转向急需的非洲史研究,1962年至1963年在国内首次开设了非洲通史课程,讲授内容侧重非洲历史,同时也涉及非洲政治和非洲国际关系等议题。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我国非洲研究人员相当缺乏,非洲国际关系研究专业人员更无从谈起,该领域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均有所欠缺,加之“十年浩劫”的影响,严重迟滞了学科发展。但是,早期学者集中翻译的一批相关研究成果为国内学界全面开展非洲国际关系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尤其体现在学术资料与信息积累方面。

1978—1999年：步入学术规范化的学科初创阶段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非洲国际关系研究也开始重新焕发生机。尤其是各级政府机构部门和高校一批涉及非洲研究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及教学的恢复与建立,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1979年)和中国非洲史研究会(1980年)两家全国性非洲研究学术团体相继成立,以及非洲研究学术刊物——《西亚非洲》(1980年)和《亚非问题研究》(1982年)创刊,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非洲研究的发展,非洲国际关系研究亦受益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前后20年,东西方关系由对峙走向缓和,非洲逐渐走出美苏争霸的阴影,非洲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下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外交重点也转向发达国家,倚重西方大国。对非外交方面,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淡化,双边关系由“特殊需要”走向正常化。这些因素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者对非洲国际关系研究的热度与议题取向。

第一,独立的中国非洲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是该学科由业余研究转向系统研究的分界点。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前身——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部)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1981年,该所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后,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并

^① 参见夏吉生《新中国研究非洲问题情况简介》,载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编《亚非问题研究》1982年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在西亚非洲系设立了国际关系专业（包括非洲国际关系研究方向）。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自 1998 年并入新成立的国际关系学院后，以非洲国际关系方向培养研究生的定位更为明确。外交学院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设了战后国际关系史课程，从 1996 年开始招收国际政治专业非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招收非洲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云南大学从 1996 年开始招收包括非洲国际关系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等等。由此，国内研究机构 and 高校中非洲国际关系研究方向专业的设置，标志着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进入专业化、系统性发展阶段。

第二，研究视角所拓宽，涉非域外利益攸关大国对非政治与外交关系仍是研究重点，同时经济关系议题明显增多。基于历史联系，法国、英国、葡萄牙等非洲前殖民宗主国仍保持对非影响力。而美国、苏联在冷战后期及冷战终结初期调整对非政策，对非关系亦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尤其是非洲国家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深陷经济危机，通过对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强同欧美国家的经济合作以期摆脱困境，这些情况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在学术研究中。这一时期，除了美、苏对非政治关系的一些著述外^①，英国、法国、日本、印度、中国等与非洲国家关系研究渐入学者视域，而且经济关系或经济合作议题分量显著增大^②。作为中国学者，在研究非洲国际关系时，始终关注中非关系史研究，尤其注重对现有文本资料的系统整理，为研究中非关系史、非洲华人华侨经济社会状况提供了系统的学术资料。^③此外，中国学者对于非洲国家间关系的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于非洲一体化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简称“非统”）的研究。成立于 1963 年的非统是泛非主义思潮的政治实践，基于其支持非洲国家实现独立和促进非洲国家团结统一的宗旨，中国学者既认识到该组织在争取和保护民族独立、加强内部团结、解决成员国领土争端、斡旋国内冲突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又分

① 参见吴期扬《苏联在非洲遭受的挫折及其根源》，载《苏联东欧问题》1983 年第 5 期；梁根成《美国同西欧国家在非洲的矛盾》，载《国际政治研究》1991 年第 1 期。

② 参加吴兆契《非洲与西方国家经济关系的发展》，载《西亚非洲》1982 年第 4 期；张宏明《法国对非洲“多党民主”政策的沿革——兼论法非关系的发展前景》，载《西亚非洲》1993 年第 5 期；江翔《日本与黑非洲关系初探》，载《西亚非洲》1995 年第 3 期；远泰《印度与非洲国家经贸关系初探》，载《南亚研究季刊》1991 年第 4 期；朱重贵：《非洲国家的外交趋向》，载《现代国际关系》1989 年第 2 期；傅政罗：《略论积极发展中非经贸合作》，载《西亚非洲》1996 年第 1 期。

③ 例如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第九辑——《非洲华工》（1984 年）、方积根编的《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1986 年）和艾周昌编注的《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1989 年）相继出版。以及艾周昌、沐涛著《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析了该组织在应对时代主题新变化方面的局限性。^① 这些研究取向与非洲一体化及非统的现实发展是契合的。二是讨论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关系。这方面主要表现为基于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利益交织而产生的边界争端问题、同一区域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等，但是此类选题总体偏少。^②

第三，从深度国际评论走向规范化学术研究，出现一批本土化、原创性专著类学术成果。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注重适应冷战时期的环境而进行信息收集、跟踪、分析和提供政策咨询不同，这一时期学术研究分量在出版作品中的比重显著提升。例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学者合著的《非洲概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1 年版），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版的第一部非洲研究专著，其中第八章“非洲对外国际关系部分”，论及非洲在苏美争霸斗争中的地位时，提出“非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战略资源，是苏、美两霸争夺非洲的根本原因”。陆庭恩著的《非洲与帝国主义（一九一四——一九三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采用历史分析法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 20 年间非洲与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与斗争进行了系统阐述。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非洲学界资深专家学者出版的非洲通史类专著中，均包含大国与非洲关系研究。杨人梗先生在其遗著《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到一九一八）》（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中，对比与分析了英、法、德、比等列强在非洲不同时期殖民统治的政策取向、特点及方式的异同性。纳忠主编的《非洲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以及由艾周昌、陆庭恩统领完成的三卷本《非洲通史》^③，破除欧洲中心论史观，以非洲人民为研究主线，阐释非洲的自身发展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体现了中国非洲学者的学术自觉性。

第四，对外开启学术交流大门，以中方学者学习、吸收、借鉴相关知识为主。改革开放使中国学者有机会接触到世界上先进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一方

① 参见唐大盾选编《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1900—1990）》，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唐大盾《团结反帝的十七年——“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及其作用》，载《西亚非洲》1980 年第 5 期；林木《从二十届首脑会议看非统组织面临的问题》，载《西亚非洲》1984 年第 6 期；孟大培、赵淑琴《非统组织三十年》，载《国际资料信息》1993 年第 11 期。

② 参见顾章义：《非洲国家的边界争端》，载《非洲资料》1982 年总第 67 期；高晋元《东非三国关系浅说——坦、肯、乌的合作与矛盾》，载《西亚非洲》1980 年第 2 期；郝望：《南部非洲国家与南非间的不平等“伙伴”关系》，载《西亚非洲》1983 年第 2 期；郝望《南非对南部非洲国家的政策》，载《西亚非洲》1983 年第 3 期。

③ “古代卷”第十二章专设“古代非洲的对外交通与文化交流”，“近代卷”包括非洲人民反殖斗争等内容，“现代卷”包括不同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对非洲政策变化等内容，参见何芳川、宁骚《非洲通史 古代卷》，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5 年版；艾周昌、郑家馨《非洲通史 近代卷》，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6 年版；陆庭恩、彭坤元《非洲通史 现代卷》，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5 年版。

面,国内学术机构和高校接待或邀请国外非洲问题研究专家来讲学。例如。1980年9月,埃及著名经济学家、阐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即依附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到访中国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做了题为《世界危机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学术报告。^①1984年9月,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卡尔·罗斯伯格、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教授于子桥等6位美国非洲问题学者首次组成代表团来华进行学术访问。另一方面,中国非洲问题研究学者也通过一些渠道走出国门,参加学术研讨会、赴非留学或进行短期学术调研,了解非洲国际关系研究状况,开阔学术视野,加深对研究对象国的认知,在国际交流中提升研究能力。

2000~2009年:学科反思中的学术自觉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大陆联合自强趋势增强,非洲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持续中高速增长期,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有所提升。由此,西方国家重新重视非洲,重返非洲的步伐加快。与此同时,中非合作论坛在2000年创立后,中非关系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如何协调好中国与其他大国在非洲的关系,需要学界提供智力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纪之交,中国的非洲研究已走过50年的历程,在开放的学术氛围之下,学界开始反思: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非洲研究?中国需要怎样的非洲研究?正是基于这种学术发展内在逻辑的深入思考,加之学者所肩负的时代责任,使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学在双重合力下向前发展,步入学术自觉发展阶段。

问题自觉是学术自觉的要义之一,在学术研究中反映在学者基于学科研究态势的研判而对研究议题进行主动设置。这一阶段,中国学者所关心的非洲国际关系议题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关于非洲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曾经作为美、苏博弈场域的非洲似乎战略价值降低,由此国际学界出现非洲发展悲观论。那么,对于全球化与非洲边缘化并行的态势,非洲国家在国际关系出现新调整、新变化情势下,在剧烈变动的世界格局中将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上述重大国际关系问题是研究非洲国际关系的学者所无法回避的。中国学者注重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来分析。从静态来看,不可否认,非洲大陆在全球贸易、投资、外援流入等方面较之前有下滑之势,反映出非洲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处于底层和被

^① 所史编写组《西亚非洲研究所40年(1961—2001年)》,内部印刷,2001年6月,第67页。

动地位，呈现边缘化态势。但从动态来看，随着非洲大陆资源丰富特点愈加突出，非洲与域外国际合作不断加深，反恐、气候变化等新的国际安全问题均使非洲置身其中，非洲在西方大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及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角色和作用值得关注，且会出现上升之势。^①

第二，关于非洲的国际战略与国家利益研究。这一时期，非洲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国家利益。有两件大事值得关注：一是 2005 年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非洲国家希望在此进程中有所作为。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会员中的比例超过 1/4，是“巨大票仓”，由此成为日本、印度等国为“入常”而争相拉拢的对象，那么非洲国家对于安理会改革有何诉求？共同立场是什么？能否争得常任理事会国席位？中国学者在相关论文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综合解析。^②二是新世纪初叶，非洲国家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谈判和国际气候制度制定进程。于是，非洲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中以何种立场出现，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于这一新议题，中国学者在他们的著述中着重解读了非洲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原则、目标、举措，及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博弈。^③

第三，关于非洲与其他主要国际角色的关系。2001 年“9·11”事件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持续贫困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穷国的贫困与富国的安全问题存在关联性，西方国家需要从富国与穷国的“发展—安全”关联性来思考全球安全问题，调整对非政策。上述认知亦反映到学术研究议题中。在针对非洲与其他国际角色（不包括中国）之间的关系研究中，美非关系研究论文数量最多，重点是乔治·布什（2001—2019 年任美国总统）当政时期美国缘何调整对非洲政策及其主要变化。除了关注经济利益，从全球以发展促安全的治理角度来观察美国对非政策新变化，且将美非关系的调整与地缘政治的重塑联系起来，这是学界对于美非关系议题研究的新亮点。^④当然，研究现实需要追溯历史，梁根成先生对于二战至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对非洲政策的系统研究，可以从找出美国对非洲政策“变”与“不变”的内在逻辑。^⑤此外，关注欧洲大国

① 参见顾章义：《新非洲与当代世界》（上、下），载《西亚非洲》2003 年第 5 期和第 6 期；钟伟云：《非洲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载《西亚非洲》2003 年第 3 期；曾尊固、龙国英、甄峰：《非洲边缘化与依附性试析》，载《经济地理》2003 年第 4 期。

② 参见徐伟忠：《非盟在“增常”问题上的立场透视》，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 年第 8 期；詹世明：《联合国安理会席位之争——非洲的立场与前景》，载《西亚非洲》2005 年第 6 期；王莺莺：《非洲与联合国改革》，载《国际问题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③ 参见詹世明：《应对气候变化：非洲的立场与关切》，载《西亚非洲》2009 年第 10 期。

④ 参见曾强：《美国对非洲政策的调整及其特点》，载《国际资料信息》2000 年第 9 期；贺文萍：《9·11 事件对美国非洲政策的影响》，载《西亚非洲》2002 年第 1 期；张永蓬：《布什缘何访问非洲》，载《西亚非洲》2002 年第 5 期。

⑤ 参见梁根成：《美国与非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与非洲关系互动的历史与现实，仍然是中国学者研究非洲国际关系的重要视点，因为它们是影响非洲外部国际环境的主要力量。^① 由于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从非洲全面撤退，它在非洲的存在与影响大幅衰减，相关研究著述也锐减。^② 而与此逆流而上的是，基于时局与国家利益的考虑，日本、印度等国加强了与非洲的关系。这一变化也反映到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中，涌现了大量学术论文。^③

第四，关于非洲国家外交政策与政治精英外交思想的研究。除了《列国志》非洲国别卷分别介绍了相关国家的外交政策外，国内学界对于非洲国家外交政策与领导人外交思想的研究，虽然已有所涉猎并出现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仍较为薄弱，而且有关非洲国家外交政策的研究成果大多局限于地区大国。^④ 有关非洲政治精英外交思想的研究，陆庭恩等主编的《影响历史进程的非洲领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评介了肯雅塔、恩克鲁玛、穆加贝、穆巴拉克、奥马尔·邦戈、奥巴桑乔、姆贝基、穆塞维尼等23位非洲国家政治人物的治国理政方针，其中包括他们的对外政策与外交思想。

第五，关于非盟的研究。伴随着非洲国家由寻求民族解放步入和平与发展新时代，全非一体化组织亦由非洲联盟（简称“非盟”）取代非统。这一升级版的非洲一体化组织究竟能否承担起引领非洲国家走向繁荣发展的新使命？中国学者通过研究，一是厘清了非盟与非统的不同点：非盟有很大的权力；组织机构更加齐备，职能、权力、运作程序更为具体；更为注重与非洲次区域组织的协调并形成合力；拥有非洲国家自主提出的发展战略规划《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为行动支撑。二是探究非盟在非洲国家内部或国家间冲突管理、安全建构方面何以施为？三是讨论非盟在加快非洲经济一体化方面的作用。四是研究非盟在参与国际

① 参见周国栋《变“父子”为“兄弟”关系——析法国对非洲政策的变化》，载《国际展望》2000年第4期；陈晓红著《戴高乐与非洲的非殖民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高晋元《英国—非洲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参见袁新华等《试析转型以来的俄罗斯与非洲关系》，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4期；张来仪《俄罗斯与非洲经济关系的困境与对策》，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3期。

③ 关于日非关系的论文，参见罗建波《论冷战后日本对非洲的外交政策》，载《国际观察》2003年第1期；李安山《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与日本援助非洲政策》，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5期；关于印非关系的论文，参见沈德昌《试析冷战后印度对非洲的外交政策》，载《南亚研究季刊》2008年第3期；刘宗义《印度对非洲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3期。

④ 参见陈天社《埃及对外关系研究》（1970—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忠祥《新兴大国外交战略评析》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6期；[尼日利亚]维克托·恩瓦奥齐奇·威本杜著《尼日利亚外交政策》（1961—2002），周平、王德鑫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事务时所彰显的非洲共同外交政策。^① 由此看来，中国学者研究非盟的目的不仅在于理解非盟内在机制和非洲一体化，而且深入分析非盟的具体对外政策，以探究非盟的国际角色。

第六，关于中非关系研究。这是非洲国际关系研究中常议常新的议题。这一时期，借助于中非合作论坛这一机制化合作平台，中非之间展开高强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面对中非关系迅猛发展的现实，国内学界加大对中非关系议题的研究宽度和深度，以满足双边关系快速发展的现实需求，不仅对于中非关系的研究成果显著增加，而且开始从更加具体的领域观察中非合作，与中国现实的发展需求联系日益紧密。中非关系研究出现一些新变化，一是从国际体系变迁视角研究中非关系。对中非关系的研究不再只是就事论事，而是突破了双边层面，以更广的国际视野来考察，体现了中国学者在国际观、角色观、研究角度方面的进步。^② 二是中非关系研究重心下沉到具体领域。大量的中非经贸合作著述自不待言，在非洲一体化、教育、非政府组织、非洲华人华侨等方面亦出现了系统研究专著。^③ 从宏观到微观，从论文阐述到研究专著，表明中非关系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三是探究中非关系的进展、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应对之策。随着中非关系日益密切，西方加大了对中非合作的攻击，炮制了“新殖民主义论”“破坏环境论”“援助有害论”等歪理邪说，由此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和问题。对此，国内学界对中非双方以及外部第三方因素进行学理性客观分析，对西方不实指责进行有理有据的回应，深入探讨中非关系未来发展的前景。四是口述史料丰富了中非关系研究的资料来源。共和国大使亲历中国与非洲国家交往的点点滴滴，他们的

① 参见杨立华《非洲联盟：理想与现实》，载《西亚非洲》2001年第5期；陆庭恩《非洲全球化与非洲联盟》，载《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2期；罗建波《理想与现实：非盟与非洲集体安全机构的建构》，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4期；万玉兰《非盟与非洲安全体系的构建》，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6期；夏吉生《从非盟成立看非洲应对全球化》，载《亚非纵横》2004年第1期；何妍、石松《“非盟”成立后的非洲经济现状及前景浅析》，载《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徐伟忠《非盟在“增常”问题上的立场透视》，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8期。

② 参见贺文萍《国际格局转换与中非关系》，载《西亚非洲》2000年第5期；陆庭恩《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与中非关系的新发展》，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参见罗建波《非洲一体化与中非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刘鸿武、沈蓓莉主编《非洲非政府组织与中非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李智彪主编《非洲经济圈与中国企业》，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龙小农《超越非洲范式：新形势下中国对非传播战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安山《非洲华人华侨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李安山编注《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1800~2005）》，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版。

著述为当代中非关系保存了具有口述史意义的一手材料。^①

2010 年以来：中非关系研究引领下的学术研究深化阶段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欧发达经济体，使这些国家陷入持续的经济低迷发展阶段。2009 年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0 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述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也使非洲国家对外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非洲的海外利益扩大，与其他国家在非洲的合作或竞争关系更为频密。由此，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代，中国的全球角色生成，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迎来新机遇，并出现星星点点的理论创新。

第一，以中非关系研究的新理念、新思想，丰富了非洲国际关系研究理论，并推进了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其一，非洲大陆的发展动态、与域外国家关系的演变为中国对外关系理论突破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与独特的研究领域。其二，研究学者重新审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从中获得灵感，中国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与学术营养为本土学者提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新话语注入了思想源泉活力。其三，中国自身物质力量、政治特性、社会现状及国际身份的变化，成为推动该领域理论创新的新动能。由此，迸发出“创造性介入”^②“道义现实主义”^③“人类命运共同体”^④等新理论、新思想火花。上述新理念可以很好地阐释中国对非合作中“真实亲诚”原则，应对苏丹达尔富尔危机、南苏丹内战、索马里国家重

① 参见李同成、金伯雄主编《中国外交官在非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陆苗耕、黄舍娇、林怡主编《同心若金——中非友好关系的辉煌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郭靖安、吴军著《出使非洲的岁月》，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江翔著《我在非洲十七年》，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年版；陈来元著《中东非洲不了情》，东方出版中心 2008 年版。

② 代表性著述是王逸舟教授撰写的“创造性介入”三部曲，即《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和《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其中关于中国海外利益的变化、中国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拓展、中国对外援助等内容的论述，大量取材于中国的对非外交实践。

③ 阎学通教授借鉴先秦百家的政治思想，并将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古代道义观相结合，创立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该理论集中体现在《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域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一书中。

④ 例如，罗建波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中非关系与中国的大国责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等著作中采用大量非洲实例加以论述。此外，学界还有诸多论著，如刘鸿武《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非共享知识体系的建构》，载《西亚非洲》2018 年第 5 期。

建等一些非洲热点议题，以及中非减贫合作与共同发展等重大现实问题。^①

第二，学术研究选题注重现实问题与学术命题的有机结合，关注新领域和新问题，体现学者学以致用治学倾向。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认识社会、改变社会，因此学者在时代话题、现实问题、学术前沿问题的研究中力求洞见。基于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学界开始思考：在各方国际力量在非实力和影响力发生渐变的情势下，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均衡地反映各方诉求的新地区秩序？中国如何处理好与传统大国、新兴大国之间在非洲的利益关系？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何以实现深化与升级？这些迫切需要回应的时代议题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尤以中非关系研究热潮为甚，突出体现为中非关系研究领域拓宽、更加精细、贴近社会现实，涉及中非关系发展与合作战略^②、中非合作机制^③、中非各领域（资源开发^④、投资^⑤、援助^⑥、安全^⑦、文化教育^⑧、科技^⑨、发展经验分享^⑩等）交流合作等诸多议题。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剖析了新时期中非关系的新变化、新

① 参见李安山《文化遗产与中国的非洲政策》，载门镜、[英]本杰明、巴顿主编《中国、欧盟在非洲：欧中关系中的非洲因素》，李靖堃译，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5—72 页。

② 参见刘鸿武、罗建波《中非发展合作理论、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杨立华等《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发展总体战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张春《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刘鸿武主编：《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③ 参见张忠祥《中非合作论坛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 年版。

④ 参见姜忠尽、刘立涛编著《中非合作能源安全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⑤ 参见唐晓阳《中非经济外交及其对全球产业链的启示》，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4 年版；杨宝荣《非洲开放式自主发展与“一带一路”中非产能合作》，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 年版。

⑥ 参见张永蓬《国际发展合作与非洲——中国与西方援助非洲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黄梅波主编《中国对非援助及投资的效应研究：中国发展经验及其对非洲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沈喜彭《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研究》，黄山书社 2018 年版。

⑦ 参见周玉渊《非洲世纪的到来？：非洲自主权与中非合作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

⑧ 参见牛长松《中国与非洲教育合作的新范式》，载《比较教育研究》2010 年第 4 期；杨薇等《非洲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传播效果研究》，载《西亚非洲》2018 年第 3 期。

⑨ 参见沈镭编著《中非资源环境科技合作战略研究》，地质出版社 2010 年版；张永宏等著《中非低碳发展合作战略背景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4 年版。

⑩ 参见李小云《小农为基础的农业发展：中国与非洲的比较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贺文萍《中国经验与非洲发展：借鉴、融合与创新》，载《西亚非洲》2017 年第 4 期；安春英《中国发展经验对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启示》，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 期。

特点和新趋势，一些研究领域则完全是开拓性的。^①其中，中非经济关系著述颇多，卷帙浩繁，体现了“一带一路”引领下中非产能合作的时代特点。由于非洲对外关系利益攸关方的调整与变化，涉非三方关系渐入学者的研究新视野，包括美非关系、法非关系、日非关系中的中国因素，以及涉非三方合作等问题^②，体现了非洲对外关系各行为体之间的强烈互动性特点。

此外，一些传统议题的研究得以延续并进一步深化，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国家对非关系研究得到学界持续关注，且更加重视内在因素的分析、国际处境的影响。^③同样重要的是，以非洲国家为主体研究其对外关系的系统性专著虽数量很有限且集中于埃及、尼日利亚、南非等地区大国，但已出现零的突破^④，加深了人们对于非洲重点国别对外关系的认知。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于非盟的研究，利用全非一体化组织成立50周年、国际社会提出2030年可持续发展动议之重要时间节点，反思与评估非盟在参与地区治理、助推非洲国家走向联合自强与共同发展之路方面的新机遇、新动力、新趋势。^⑤

① 参见张春《地方参与中非合作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非国际商学院《2017浙非产能合作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智宇琛《中国中央企业走进非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温国砧《非洲商人在广州的社会融合度及其影响研究——基于移民适应理论的视角》，载《改革与开放》2012年第4期。

② 参见张宏明《如何辩证地看待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兼论中国何以在大国在非洲新一轮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载《西亚非洲》2014年第4期；刘中伟《美非关系中的中国因素》，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3期；吕耀东《从〈内罗毕宣言〉看日本在非洲利益的深化及其战略意图》，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6期；智宇琛《法国对非军事政策演变及对中法非和平安全合作的启示》，载《国际展望》2016年第6期；张春：《涉非三方合作：中国何以作为？》，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3期；张宏明主编《大国经略非洲研究》（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③ 参见张宏明主编《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与非洲经贸合作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陈积敏、魏雪梅《美国对非洲外交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李新烽主编《郑和与非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徐国庆《印度与南非伙伴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王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非洲外交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此外，由张宏明主编的《2014年非洲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西亚非洲》2018年第5期和2019年第2期都刊发了大国与非洲关系专题，涉及俄非、葡非、日非、英非、法非、德非、美非、土非、印非等双边关系论文。

④ 参见陈天社等《当代埃及与大国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方伟《新南非对外关系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杨广生《尼日利亚对外关系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⑤ 参见罗建波《通向复兴之路：非盟与非洲一体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舒运国著《泛非主义史1900—2002》，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张春《中非合作的政策空间变化与应对战略》，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3期；梁益坚《非盟地区治理：非盟相互审查机制探微》，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6期。

第三，研究范式与方法出现转型与创新。一是得益于中非之间国际交流渠道的增多及资金支持，如 2010 年 6 月启动的“中非高校 20 + 20 合作计划项目”，研究人员遂走出书斋文献，注重对研究对象国进行多次或相对长时段的实地调研、访学、建立研究基地^①，使他们的史料研读与田野调查深度结合，实证研究渐入佳境。二是科研组织形态由原来的个人“单打独斗”、研究室为单元或临时课题为纽带，发展为组建创新研究团队，由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组成，形成融政治学、外交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多种研究范式于一体的跨院校、跨学科、协同性交叉研究的特点，推动学科体系创新。三是伴随着中国学者对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尤其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2010 年 3 月启动）、“中非智库 10 + 10 合作伙伴计划”（2013 年 10 月启动）的带动下，中国与非洲国家、美欧研究机构的联合研究课题增多。2019 年 4 月成立的中国非洲研究院在发布课题研究项目时，明确规定课题研究需采用中非学者联合研究方式。此外，随着一些接受了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学者群体成长为学术骨干，以及那些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知识和研究方法的青年学者回到国内，提高了研究人员对非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能力，并带动研究方法创新。

第四，在国家日益需要知识供给的背景之下，新型研究成果即智库研究报告突起。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角色的变化，如何研判并妥善地应对诸多国际问题成为政府的迫切之需，研究型智库呼之欲出。2015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国内相关研究机构遂向智库转型，高校科研或教学院系亦兼具智库功能。由此，近年学者的研究成果除了以学术专著、论文、学术资料、译著等方式展现以外，对策研究类智库学术产品突起。一是以内部信息报送方式，研究大国在非洲的新情况、大国或非洲国家对中非关系的舆情及影响等；二是公开出版国家智库报告。^② 此类创新型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

① 例如，2011 年中国农业大学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的两个村落开展农业项目及进行跟踪研究；2018 年 12 月，华东师范大学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设立了首个海外工作站——非洲工作站。

② 例如，2018 年 8 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新时代中非友好合作”系列智库报告，包括主报告——《新时代中非友好合作：新成就、新机遇、新愿景》，以及论及投资、产能、减贫、人文交流、和平与安全、企业社会责任、债务问题等 9 个分报告。2019 年 10 月，“中国非洲研究院文库·智库系列”丛书又推出了《非洲华侨华人报告》《中非双边法制合作》《印度与非洲关系发展报告》《中欧非三方合作可行性研究》《中国与东非共同体成员国友好合作》《中国与埃及友好合作》《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友好合作》《中国与津巴布韦友好合作》等 8 本国家智库报告，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反思与前瞻

总地看来,经过 70 年中国学者艰难且持续的探索,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从深度国际评论到规范化学术研究,从宏大叙事研究风格到微观实证性专题研究,从回应政府需求研究到方法意识、问题意识及理论意识的学术自觉,无论是研究议题的更新,还是学术资料的累积,抑或研究范式的创新,都取得了彰明较著的进展。回望历史,审视当下,思考未来,中国学者需要继续在以下几方面着力推动中国非洲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

第一,补齐短板,完善学科体系。从目前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学术地图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为代表的国内该学科研究力量齐聚北京,成为该学科学术研究重镇。而国内科研人员的流动及中国对非外交研究成果需求的迫切,则推动非洲国际关系研究学术地图进行了重组,上海、浙江、云南均形成具建制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是该学科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力量。上述可盘点的研究机构虽可罗列十多家,但进行非洲国际关系的教学研究人员实际体量过小,人员缺乏,与时代的要求和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另则,从非洲国际关系学科内部结构看,偏重域外大国对非关系研究,尤以中非关系为甚,而非洲国家对外政策、战略利益、外交重点等研究较为薄弱,非洲国家间双边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尚付阙如,亟待加强。欲改变上述现状,需要上下两条路径形成互动:其一,从人才培养的上游为切入点,优化中国国际关系学位点的布局,调整过于倚重美欧大国以周边国家国际关系研究的失衡态势;借力于“一带一路”的良好语境,大力扶持非洲区域与国别研究培育基地;通过各层级课题设置,引导学界进行非洲国家关系研究中的薄弱议题。其二,在大学本科教学中,开设非洲国际关系史等通识课程,培养学生对该学科领域的学术旨趣;吸引在国外学习或研究的该领域学者回到国内,充实该学科研究队伍;通过学术期刊、网站、微信等多元学术平台,引导学者探讨相关学术话题。

第二,努力建构自主性学术体系。毋庸置疑,引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给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一场场头脑风暴和观念变革,改变了国内这一学科的研究格局,出现了运用建构主义、现实主义、区域一体化理论等研究非洲国际关系之现象。一些学者遂将之视为这一学科诸专题研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前沿,而忽视了本土化理论与研究新方法的探索。事实上,随着国际格局

的变化、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在对非关系中位势上升，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已经进入了转型期，需要在非洲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呈现出的全球多元化思潮中占据一席之地，体现中国元素或中国特色。从理论层面看，研究人员应摆脱“规范化”与“本土化”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突破西方中心论桎梏，把握中国非洲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的主体性。其一，从当代全球国际关系视野出发，深入研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的经典著述，挖掘其中蕴含的诸多智慧与哲思，结合研究对象利益攸关国或关系国的政治文化，阐释大国对非政策、国际行为等之内在机理。例如，研究学者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信”“和”“合”等理念，阐释中国对非关系中的合作共赢新思想。其二，总结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例如，学者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解读与分析殖民地理论、新殖民主义论。其三，从中非关系丰富的实践凝练出中国对非关系中的新概念、新观点和新理论。基于中国成为非洲对外关系的重要行动体这一现实，中国学者可以中国为本，围绕中国模式、中国外交、中国战略、中非关系等核心问题，从中非政治、经济、安全、减贫等丰富的实践样本出发，提出中非关系、中非合作、中国解决非洲问题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例如，中国在对非减贫合作中已形成独特的合作模式，丰富了南南合作国际减贫理论。在中非关系的问题上，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颇具特色，是获得理论自主性与本土化的重要沃土。由此，立足中国对非关系的“问题意识”，将中国学界的理论需求供给与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建设需求真正结合，才能真正做到理论上“引领双边关系”和实践上“解决问题”。

第三，选择多元化研究方法，且需不断探索新方法。从中国非洲国际关系研究演变轨迹看，它源于史料挖掘与运用，但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仅靠一个视角、一种路径或一门学科，难以解决任何理论与现实问题。例如，对于特朗普政府 2018 年底出台对非新战略的解读，既需要以美国对非政策的历史考察为基础，也需要从心理学角度探微其人格特征，还需要梳理他执政以来的相关对外政策具体做法等。否则，研究会陷入就事论事、浅尝辄止的表象分析。为此，深入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学者合理保持旧传统、采用新手段、融贯多学科。其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学者搜集相关数据和材料提供了便利，但是原始一手材料的使用和积累仍然是拿出一流研究成果的基本条件。为此，学者一方面要阅读相关文本资料，另一方面更要脚踩田野，通过实地调研访谈，获取扎实且可靠的资料。其二，提倡多学科支持下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例如，历史学就常与国际关系学相伴，非洲国际关系研究主要以涉及各国安全和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的政策性研究为主，在分析具体问题时，若能结合与之相关的历史因素，会

增加文章的思维深度与纵深感，从而增加文章的穿透力。其三，在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通过相关大数据库筛选、整理索马里青年党的恐袭频次、活动地点等信息，可预测该组织给相关国家带来安全风险的等级。

第四，加强学术话语传播能力建设。由于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起步较晚，西方学术话语体系长期居于强势地位，形形色色的理论、论断或名词等层出不穷。中国学者运用西方资料进行相关研究，易陷入西方话语绑架的窘境。加之，中国学者的著述译成外文著述偏少，仅有两本涉及非洲研究的期刊——《西亚非洲》和《中国非洲学刊》。尽管近年来，国际学术交流具有多渠道、多形式特点，但中国非洲国际关系研究话语权建设亟待加强仍是不争的事实。要消解西方话语霸权，其一，要培养具有国际话语传播能力的人才，具备熟练的外语语言表达能力、思辨思维、高质量的相关研究成果，在研讨会、访学等学术交流舞台畅达地阐释自己的观点。例如，采用恰当的表达方式，让受众能理解“中非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的内涵。其二，加强传播平台建设，包括中非双方、中国与其他国家研究机构，或中非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机制建设，举办或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尤其是参与研讨会议题设置），出版英、法文等外文出版物，以多渠道、多样化方式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和中非友好合作故事。

（责任编辑：吴传华）